



语
言
学
论
丛

英语数字素养 评价研究

Assessing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College English Students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013370403

H319.3

185

言
学
论
丛



英语数字素养 评价研究

Assessing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College
English Students

张薇 著



北航

C1678309

H319.3
185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语数字素养评价研究/张薇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9
(语言学论丛)

ISBN 978-7-301-22871-5

I. ①英… II. ①张… III. ①英语—阅读教学—网络教学—教学评估—高等学校②英语—写作—网络教学—教学评估—高等学校
IV. ①H3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2175 号

书 名: 英语数字素养评价研究

著作责任者: 张 薇 著

责任编辑: 黄瑞明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871-5/H·334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382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信箱: zpup@pup.cn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0.75 印张 180 千字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04CYY012)成果。本书的出版得到“北京
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经费资助。

特此致谢！

序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张薇博士的《英语数字素养评价研究》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网络的大学英语研究性评价模式”(批准号: 04CYY012)的最终成果,现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在 21 世纪之前,读写能力(literacy)说明一个公民受教育的程度。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发展,当代人们对读写能力有了新的认识、新的界定、新的要求,这就是数字化时代公民所受教育状况,或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的“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数字素养指利用各种数字技术查索、阅读、接受、理解、写作、评估和创建新知识的能力。它要求电子一代具有“识别和利用数字素养的能力,从而操作和改进数字媒体,进行多方面传播,并使这些媒体很方便地适应新的形式。”^①因此,数字素养涵盖人们常说的计算机读写、多媒体读写、信息读写、新读写能力、超读写、电子读写,以至 21 世纪读写等方面的内容。

在本书中,作者主要讨论数字素养的一个方面,英语数字素养。这对我国实现改革开放具有重要意义,并自上世纪 80 年代末起最初以“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CALL)的形式推行多年。在一定意义上,这是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和义务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我曾碰到一些上年纪的外语教师,他们辩称不懂计算机也可以学好外语。其实,英语数字素养不仅表现在英语教师可以在教室中采用多种媒体进行教学,提高教学效果,而且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学习、查找信息和进行创新思维的能力。这与传统的英语听说读写技能教育有明显的不同。当然,我们在英语数字素养方面的经验必然会带动外语数字素养,以及其他专业的数字素养。

数字素养主要在 21 世纪才获得巨大发展。在此期间,究竟取得

^① Jenkins, H. (2009). *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s of Participatory Culture: Media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哪些成就?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应该如何建立有效的评价模式促进学生英语数字素养的发展?这需要持续地及时评估,给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回答,这是《英语数字素养评价研究》的主要目标,也是本书的真正价值所在。本书作者在第一章开宗明义引入了数字时代的大学英语学习评价模式,可谓画龙点睛之作。完成此项任务,要求研究者除课程开发与评价理论外,还要掌握数字技术。最初我对作者如何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不很清楚。拿到手稿后才发现作者在北京大学英语系早就开设 Doing English Digital 这门课程,历经十年。作者通过她丰富的教学经验,给我们论述了本课题的评估目标和研究项目,建构主义的网络学习环境,以及评价工具的设计。在这十年八个学期中,作者组织了3轮教师小组评价,终于完善了评价量观的设计(第3章)。这个评价量观又具体包括“内容”“清晰性”和“评判性和创造性思维”三个评价维度,重点评估评价量观的稳定性(第4章)和有效性(第5章)。这种精益求精的科学的治学态度应予肯定。

作者在本书第六章“结论”中除对评价量观的稳定性和有效性进行评析外,还对十年来的研究进行反思,提出教师应当拓展传统的大学英语教育目标、教学方式与教师角色;提高学科素养、研究意识和扩展学术视野;和获得英语教育决策者的长期支持。这三点,特别是最后一点,表明作者已有意地认识到或无意地接触到如何搞好我国的(大学、高职高专和义务阶段)英语教学和外语教学这个命题,这不仅仅是一个学科建设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英语教师和英语学习者的问题,而是一个超学科研究的问题。^①它涉及全国人大、教育部领导、学校领导、学生和家长、社会共识等多个方面。

本书作者张薇早在1984年17岁时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1988—1991年在我指导下获得硕士学位。1997年我向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 Clifford Hill 教授推荐张薇攻读博士学位,她勤学苦读,不负众望,于2003年获得国际比较教育博士学位。回北大后,2004年升任副教授,除基础课外,先后开设“学术英语写作”,“英语新闻读写”,“英语教学法”等课程。

张薇为人低调,不事宣扬。直到最近,我才了解她20年来默默无闻地工作在教学第一线,成就突出。如她的教学和研究受到国内外许

① 胡壮麟,2012,超学科研究与学科建设[J],《中国外语》,第6期。

多高校的重视,先后在中国教育电视台讲授“踏出国门”(First Step Abroad — Berlitz Business English);在陕西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西部地区大学英语教师暑期培训班讲授“世纪之交的语言教育”;德国国际女子大学(IFU)讲师,兼 *Future of Education* 研究项目协导师;在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讲授 *Pedagogical English Grammar*;应美国 ETS 考试中心邀请从事新托福考试的教师培训工作;在香港城市大学开设“话语分析”研究生课程。张薇还应邀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挪威科技大学、越南顺化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扬州大学等高校做过专题报告。

在完成繁重教学任务同时,张薇曾参与多个国际、国内教育科研项目。除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网络的大学英语研究性评价模式”外,参与美国 TESOL 的 CEFLS 项目,成果为与国内外英语教育专家合著的教师发展系列著作《英语课程标准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1—4 册(McGraw-Hill/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张薇在国内外多家著名杂志担任编委或评审,如美国 *Computers & Composition* 杂志编委,北京大学《语言学研究》编委,美国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IJCALLT)* 杂志编委,美国 *Women & Language* 杂志编委,英国 *World Englishes* 杂志评审。张薇所写的论文多半在国外著名刊物上发表。

从获奖情况看,张薇曾先后获得 2004 年教育技术协会主办的“全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暨网络环境下外语教学学术会议”论文一等奖,2005 年国家精品课程北京大学《大学英语综合课程》奖(主讲教师之一),2007 年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优秀教师奖等。

作为张薇曾经的老师和同事,我目睹她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深刻领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真谛,谨以此序表示我的钦佩之心和庆贺之情。愿在我有生之年仍能见到张薇获得更多更大的进步,为祖国的外语教育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胡壮麟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3 年五一节

前言

近年来,以促进学生发展数字时代的新知识与新技能为目标的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教育与评价已逐步成为国内外语言教育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在笔者200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基础上,本书结合近十年来在北京大学开设的一门学术英语课程 Doing English Digital 的评价设计与教学实践,围绕较为复杂深入的与学生专业相关的基于数字资源的研究项目,探究以促进学生发展为目的、由教学主体参与的、与教学紧密结合的英语数字素养项目式学习评价模式的构建与实践,旨在为中国大学英语教育评价改革提供一个新的思路与实践方案。

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介绍英语数字素养评价研究的背景、本书的基本研究问题及研究方法;第二章描述 Doing English Digital 课程的学习(评价)目标、英语数字素养研究项目的设计、网络学习环境的建设与评价工具的设计;第三章描述评价量规研发的三个阶段;第四章与第五章分别从量与质两个方面分析评价量规在使用中的稳定性与有效性;第六章总结、反思研究结果并对未来的应用与拓展提出建议。其中,第一章与第三章的部分内容曾发表于《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2期(论文标题“英语数字素养的研究型评价模式”),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曾发表于《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3年第2期(论文标题“基于数字读写项目的学术英语模块化课程构建与实践”)。特别向这两个刊物的编辑们致谢。

这项研究工作得到了许多支持与帮助。首先感谢国家社科基金对本研究的资助,为项目的完成提供了基本保障。感谢北京大学所有参加这项研究的历届选课学生;感谢北京大学图书馆聂华副馆长及她的同事们对课程网络模块建设的支持;感谢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副院长(原英语系大学英语教研室主任)赵杨教授在课程开设初期的支持;感谢北京大学英语系的林庆新博士、刘红中老师、孙玉教授、蒋晓云老师、刘璐博士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应用英语学院的唐耀彩

老师、东北师范大学英语系的刘宏刚博士、北京大学应用语言学研究
所李寒冰(博士候选人)对评价量规的试用与建议;感谢美国 William
Paterson 大学 Alice Deakins 教授在教学语法领域的讨论;感谢南京
大学英语系丁言仁教授关于标杆研究报告的讨论。最后,特别感谢我的
博士导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评价研究专家 Clifford Hill
教授对于整个研究项目的关心与支持。

张 薇

2013 年 5 月

北京大学英语系

目 录

第一章 构建数字时代的大学英语学习评价模式	(1)
第一节 数字时代的大学英语教育目标	(1)
第二节 评价范式的变革	(5)
一、基于测量范式的标准化考试	(5)
二、走向教育性评价范式	(6)
三、英语数字素养评价研究	(7)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8)
第二章 Doing English Digital 课程与评价设计	(12)
第一节 学习(评价)目标	(12)
第二节 基于数字资源的研究项目	(13)
一、研究项目描述	(13)
二、研究项目设计的基本原则	(14)
第三节 建构主义网络学习环境	(15)
一、网络教学模块	(16)
二、网络学习社区	(20)
第四节 评价工具	(23)
一、评价表	(24)
二、评价量规	(27)
本章小结	(33)
第三章 评价量规的研发	(34)
第一节 量规研发第一阶段	(34)
一、量规设计	(34)
二、教师评价小组、评价对象及评价过程	(35)
三、评价结果分析	(35)
第二节 量规研发第二阶段	(37)
一、量规修订	(37)
二、教师评价小组、评价对象及评价过程	(38)
三、评价结果分析	(38)

第三节 量规研发第三阶段	(39)
一、量规修订	(39)
二、教师评价小组、评价对象及评价过程	(44)
本章小结	(49)
第四章 量规的稳定性评估	(50)
第一节 整体评价结果描述	(50)
第二节 量规应用的稳定性	(51)
一、相关法检验	(52)
二、一致性百分比检验	(53)
三、Kappa 系数检验	(54)
本章小结	(57)
第五章 量规的有效性评估	(59)
第一节 Accomplished 等级标杆研究报告	(60)
一、于悦的研究报告	(60)
二、于思齐的研究报告	(74)
第二节 Promising 等级标杆研究报告	(82)
一、徐阳阳的研究报告	(82)
二、柳菲的研究报告	(94)
第三节 Developing 等级标杆研究报告	(107)
一、吴浩的研究报告	(107)
二、刘勤的研究报告	(118)
本章小结	(125)
第六章 讨论、反思与拓展	(127)
第一节 研究结论	(127)
第二节 研究者反思	(132)
第三节 应用与拓展	(133)
参考文献	(136)
附录 于悦的研究报告	(142)
附录一 书面报告	(142)
附录二 PowerPoint 幻灯片	(154)

第一章 构建数字时代的 大学英语学习评价模式

评价改革是当前中国大学英语教育改革的关键。构建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大学英语学习评价模式,达到使学生“在今后的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的总体教学目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7),我们应当从英语在中国社会的实际使用出发,根据中国大学生在数字时代的学习与工作中的英语交际需要,重新建构大学英语教育目标。

第一节 数字时代的大学英语教育目标

中国步入数字时代后,英语在中国社会的使用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当代中国社会的英语使用正越来越紧密地与信息技术联系在一起,网络环境下的英语交际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英语交际的主要形式。要使学生胜任现代社会的学习工作、有效参与数字时代的社会进程,大学英语教育应培养学生在新技术环境下的英语交际能力。这一新的英语教育目标已成为国内外语言教育家的共识(Hill, 1998; Kress, 1999; Shetzer & Warschauer, 2000; 胡壮麟, 2007a; 朱永生, 2008)。^①

数字时代的中国大学生究竟需要学习什么样的英语交际能力?在互联网刚刚开始发展的 20 世纪 90 年代, Gilster(1997)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的概念。^②他指出,互联网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改变了传统的交际规则与读写经验,人们可以更主动地获取

① 新版《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7)附件二“学生英语能力自评/互评表”的评价要点部分体现了这一教育目标。

② 国内外学者使用多种术语描述数字时代的交际能力。常见的英文术语包括 digital literacy, digitalliteracies, electronic literacies, information literacy, multiliteracies, multimodal literacies 等;常见的中文术语则有数字素养、多元识读、多模态识读等。其核心都是指在新技术环境下使用多种符号资源参与数字时代社会实践的能力。

信息并更方便地使用文字、图像、声音等多种符号资源表达思想。根据 Gilster 的定义,数字素养主要包括获取、理解与整合数字信息的能力。具体包括网络搜索、超文本阅读、数字信息评判与整合等技能。贯穿所有这些技能的核心是以评价、判断为主要特征的评判性思维能力(critical thinking)(Gilster, 1997: 37)。

Gilster(1997)的定义揭示了数字素养与传统印刷读写的重要区别,凸显了高层次思维能力在数字素养实践中的重要性,不足之处是忽略了数字素养实践的具体社会情境。在 Street(1984, 2001)的读写研究影响下,^①新读写研究重要学者 Lankshear 与 Knobel(2008: 5)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强调数字素养实践的社会性。他们认为,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ies)是多元的,包括无数“以通过数字编码制作、接受、传播、交换的文本为介质的有意义的社会实践与构想”。根据这一定义,从使用社交网络交友到网络购物都属于数字素养实践的范畴。多模态研究的前驱 Gunther Kress 则在一系列研究中特别指出多模态资源的运用能力的重要性(1999, 2013)。我们可以看到,数字素养的内涵已突破传统意义上以文字为中心的读写能力,开始扩展到新技术环境下使用文字、图像、声音等多种符号资源参与社会进程的能力。^②

从多元的数字素养概念出发,在中国的大学英语教育情境下,英语数字素养可以界定为在新技术环境下运用英语及多种符号资源进行学术研究、知识建构与成果交流的能力。美国西北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伴随着互联网、移动电话长大的大学生虽然常被称作“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但他们评判数字信息可靠性的能力仍很欠缺(Perez, 2010)。在全球化背景下,要使中国大学生有效地参与数字时代的学术活动与国际交流、成长为国际型人才,我们需要培养学生有效利用各种搜索资源在浩瀚的互联网检索与专业研究相关的信息的能力,培养学生阅读由文字、图像、声音等链接而成的非线性的、多模态的超文本的能力,培养学生评判、筛选可靠的数字信息的能力,培

① Street(1984)主张在读写教育与研究中以读写的“意识形态模式”(ideological model of literacy)取代脱离社会情境的“孤立模式”(autonomous model of literacy)。

② 这一定义是对 Halliday 总结的读写(literacy)概念在新技术环境下的延伸。Halliday(2007: 98)在梳理读写概念的演变时指出,读写能力已用来泛指“有效参与社会进程”的能力。

养学生整合多种数字信息并用英语及其他符号资源构建、表述新的知识的能力。

在数字素养尚未完全内化的今天,一些人对新的读写实践在人类认知上可能造成的后果表示忧虑。在颇具争议的“Is Google making us stupid?: 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一文中, Nicholas Carr(2008)指出,十多年大量的网络搜索与在线读写几乎使他丧失了专注与沉思的能力。他认为网络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造成了年轻一代阅读能力的下降。类似的看法在中国也不少见。笔者搜集本书文献资料时,就在万方期刊网新一代学术数据库搜索框下看到一行红色的提示——“ilib 提醒您: 过度搜索会危害您的智商”(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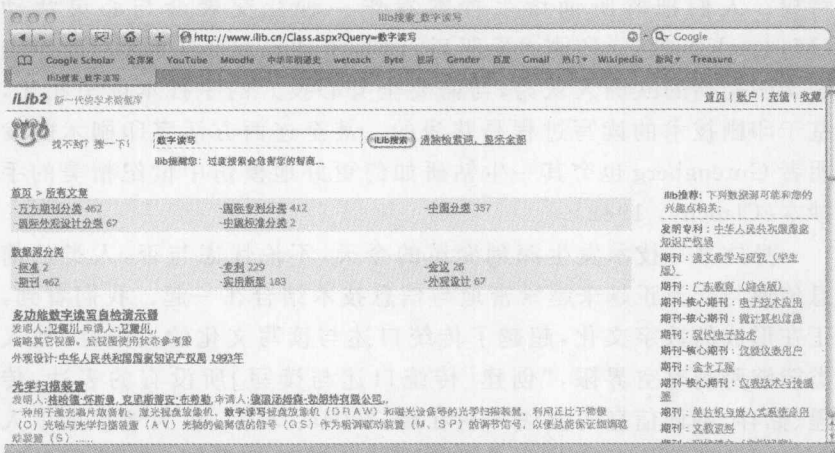


图 1-1 万方期刊网抓图

对读写与新技术日益深化的结合的隐忧并不是数字文化发展进程中所独有的。当我们把数字素养置于话语的技术化过程的历史视野之中时,就会发现从口述到读写,从手抄本读写到印刷读写,话语技术化历程中每个新旧技术的交替时期,都存在着对新的读写技术的怀疑甚至排斥(Ong,1987)。

人类早期主要依赖听说进行信息交流与传递。随着文字与书写技术的发明与发展,书写逐步内化,读写成为人类信息交流与传递的重要方式。Ong(1987)根据话语的技术化历程把人类读写文化历史划分为图画文字、手抄本、印刷文化与高技术文化四个阶段。生活在

口述与读写文化交替时期的柏拉图(公元前 427 年?—公元前 347 年),尽管自己著述颇丰,却明确反对书写。在 *Phaedrus* 与 *Seventh Letter* 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出“书写是非人性的,会破坏记忆,削弱人的思维能力,使人习惯于依赖外部资源而非内部资源”(转引自 Ong, 1982: 79)。在中国,生活在口述仍占主导地位、书写主要用于记录“王者之事”的春秋时代的孔子(公元前 551 年—公元前 479 年),实际上并没留下一简有其署名的文字。如果从孔子所处的时代来理解他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信条,就不难看出其中所蕴涵的对口述文化价值观的坚持(叶舒宪, 2006, 2008)。

在从手抄本读写向印刷读写过渡阶段的欧洲,可以看到类似的对新的读写实践的怀疑与轻视。在中世纪的欧洲,读写是少数人的特权。人们把聆听诵读手抄本看作一种社交聚会与心灵活动(Manguel, 2004)。印刷术发明后,读写活动日趋私人化。^① 处于印刷文明初期的欧洲人认为,与需要全身心投入的手抄本读写相比,基于印刷技术的读写过程是肤浅的。甚至连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 Gutenberg 也穷其一生钻研如何更好地模仿中世纪精美的手抄本(Clanchy, 1982)。

身处书写技术发生深刻变革的今天,不论忧虑与否,人类的信息传递与交流正越来越紧密地与信息技术结合在一起。我们看到,正在形成的数字文化,超越了传统口述与读写文化的局限性,使人类能够跨越时空界限,“创建[传统口述与读写]所没有的表达、传递、储存、翻译信息的方法”(胡壮麟, 2004a: 349),极大地扩展了人类交流的可能性与交流方式的多样性。传统的基于印刷读写的英语教育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如何围绕英语数字素养这一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新的教育目标,改革传统英语教学与学习评价模式,确已成为中国英语教育界乃至世界各国语言教育界需要严肃应对的挑战。

① 1041—1048 年间,北宋的毕升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术。但是,毕升的发明并没有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他的整套胶泥活字被沈括的侄子辈作为古董家藏,没有在社会上得到普及(张秀民, 2006: 532)。中国印刷文化的真正形成是在鸦片战争后西方铅活字印刷术在中国的普及之后。

第二节 评价范式的变革

一、基于测量范式的标准化考试

1987年全国性的大学英语考试推出以来,基于测量范式的大规模标准化考试及以此为范本编制的课程考试成为我国高等院校大学英语的主要考评方式。基于测量范式的英语测试的理论基础主要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心理测量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其基本假设是语言能力独立存在于人们的具体社会活动之外,是可以进行分解、量化的。

量化语言能力的思想源于19世纪末欧洲的心理测量研究。法国心理学家 Alfred Binet 和 Theodore Simon 编制了“Binet-Simon 量表”以“精确区分”所谓“弱智”儿童与正常儿童的个体智力差异(Binet & Simon, 1916)。为了分析智力测试的结果,英国心理学家 Francis Galton 与 Charles Spearman 发明了因子分析法,提高了“Binet-Simon 量表”的解释力(Spolsky, 1995)。一战期间,斯坦福大学心理系 Lewis M. Terman 教授将“Binet-Simon 量表”修订为“Standford-Binet 量表”,编制了用于军队征兵及中小学入学考试的大规模团体测验(Sacks, 1999)。与此同时,教育测量学鼻祖、美国教育心理学家 Robert M. Thorndike 运用统计学原理,编制了第一批标准化教育测验及作文量表等测量工具。他的广为流传的“万物皆以一定数量存在,因而都可量化”的观点,集中体现了印刷读写时代的测试范式的基本前提假设。值得注意的是,Thorndike 并没有忽略测量的局限性。他承认,要精确测量较高层次的读写能力是比较困难的(Monroe, 1939)。20世纪中期,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 Robert Lado 设计了系统的标准化语言测试方法,确定了围绕语言知识与离散技能的具体测试目标及以选择题为主的测试形式,终于完成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心理测量学在语言测试上的联姻(Lado, 1961),对20世纪盛行于世界各地的、包括中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在内的大规模考试的设计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基于测量范式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具有便于机器阅卷的优势,能够快速提供量化的测试结果,可为各级教育部门监督教学效果、实

行教育问责提供决策依据,也可作为社会用人单位筛选、录用员工的便捷参照。但是,标准化考试无法有效促进学生在新技术环境下的交际能力。正在推进中的大学英语四六级网考借鉴新一代托福网考的设计,把考试的介质从纸笔改为电脑,降低了选择题的比重,并在题型设计上增加了听与说、听与写的结合(金艳、吴江,2009)。然而,考试介质的改变并不意味着评价目标与测试形式的改变,测试任务中有限的语言技能的综合与基本的电脑操作未能充分体现出数字时代的大学英语教育目标——以评判性与创造性思维为核心的获取、理解、整合多种与专业相关的网络资源并用英语交流研究成果的英语数字素养。^①

二、走向教育性评价范式

随着大学英语教育改革的深入,要求改革大学英语学习评价体系、改变标准化考试一统天下局面的呼声愈来愈高(韩宝成,2002;牛强,2001;唐雄英,2005;王笃勤、姜玉珍,2008)。与此同时,教育评价界正在经历着一场从量化测评到质性分析,从控制到对话,从情境孤立到情境相关,从以教育问责为目的到以支持学习为目的评价范式的变革(Wiggins, 1998;田莉,2008;王凯,2004;赵必华,2003)。在这个形势下,教育部高教司在新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7)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要使用多种大学英语学习评价形式(如课堂活动和课外活动的记录、网上自学记录、学习档案记录、访谈和座谈等)“充分考核学生实际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采用学生自我评估、相互评估、教师对学生的评估、教务部门对学生的评估等多种方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实现使学生“在今后的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的教育目标。

新《教学要求》突出了评价学生实际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的重要性,对于增强大学英语学习评价的教育性功能,突出大学英语教师与学生在评价活动中的主体性,构建多元的大学英语学习评价体系以满足评价的不同功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一些教师也开始了大学英语学习评价改革的探索。例如,探索形成性评价对大学英语教学的意义(郭茜、杨志强,2003;罗少茜,2003),尝试跟踪、

^① 与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不同,电脑操作能力(computer literacy)主要指使用键盘打字、文字处理等基本电脑操作技能。